

道光时期以来浙江鸦片流播问题初探

赵 华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37)

【摘要】清朝道光统治时期,沿海省份浙江成为遭受鸦片侵害的重灾区之一。台州、温州种植罂粟、售卖鸦片,嘉兴、杭州、宁波等地鸦片走私入境。吸食与贩卖行为是造成鸦片毒害蔓延的重要因素。外国鸦片商,闽、粤等地的商贩,本省烟贩和鸦片吸食者,盗匪游民等均是鸦片利益的“收获者”,成为官方处理鸦片问题的巨大障碍。

【关键词】道光时期;浙江;鸦片;种植;流播

【中图分类号】K 249.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 6285(2010)09- 0116- 04

鸦片流播有两个重要环节,即鸦片的贩卖与吸食,也就是说,鸦片要通过贩卖和吸食作为中介才能真正流播开来,这个流播包括了鸦片的地理位移和鸦片的生理消费。吸食人群的状况是鸦片流播的终极状况,只有吸食人群的存在才能形成鸦片流播的整个链条。就晚清时期浙江情况而言,上述两个条件的具备,使得鸦片流播成为一个困扰民众生活的社会问题。

一、本地种植与鸦片流播

道光十九年(1839),宁波所属宁海县已有 230 余亩的罂粟花苗^{[1]34},原因与鸦片的高额利润有关,所谓不良之人开始种植罂粟花,取浆成膏。1840 年,“宁海县查出栽种人犯四名,仅获陈一辞一名,尚有妙阿狗等三名未获”^{[2]38}。

浙江出产的鸦片中较出名的是“台浆”,这是台州地区出产鸦片的特点。台州府所属各县,几乎都有鸦片种植,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已经出现这种状况。台州府属诸县“地广而土性碱,不宜五谷,惟每年所植罂粟,出浆不下数十万石。”^{[3]184}19 世纪 80 年代时,台州府地面的罂粟种植面积已占 80—90%。当时的《益闻录》曾刊文指出:“浙东台郡,田家春熟,概种罂粟,豆麦则十居一二,每五月后,罂粟收获,始下谷苗”^{[3]161-162}。台州种植罂粟有其特殊的原因,“从前地方官因台民抗粮者多,种罂粟者完粮较易,遂之不禁”^{[2]39}。台州百姓通过种植罂粟获得的利润数倍于稼穡,当地人用罂粟子榨油,用罂粟叶为田地加肥,制作鸦片出卖,竟然成为有名的“台浆”。

与之毗邻的温州地区也受其影响,有种植罂粟的现象。史料所载,“温州五属县,所产鸦片,以瑞安为最,永嘉、平阳、乐清次之,泰顺又次之。通计每年出浆,约值银十余万元。”^{[3]162}“玉环厅之台山、永嘉县之廊下、花坦、岩头、岭头、楠溪,乐清县之芙蓉,平阳县之南港、赤溪、金乡各等处”^{[2]39},其西边的处州府(今丽水)也逐渐遭到鸦片的侵害。

瑞安、永嘉、平阳、乐清和泰顺的鸦片产量不仅提供了本地吸食者的用量,还远销福建,同时,也将这种鸦片毒害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去。光绪年间中后期,“温州出产的鸦片大量销往福建,并在跨地区的贸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3]162}。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B 09LS09)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0- 06- 21

作者简介:赵 华(1978-),男,山西太原人,历史学博士,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社会史。

鸦片畅销的后果中,温州许多茶农弃茶种罂粟是一个特殊的后果。茶农成为烟农,是鸦片流播源头上的重大问题,也可以说,罂粟种植不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温州及其邻近地区人们的生活内容和习惯,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经济作物生态规律,其后果是严重而巨大的,但是当时人们未必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鸦片流播蔓延愈广,成为一个顽疾。

台州、温州这两个地区或者可以看作鸦片在浙江本地泛滥的源头。从道光十九年(1839)清廷颁布的禁烟章程,以及道光十九、二十、二十一年的官员奏折来看,均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令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政府非常震惊。当年的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在奏折中表示,为应对此类事件,准备制定相当严密的、就当时情况而言所能想到的整改措施,也包括对地方官员的要求。

绍兴府的山区部分也有罂粟种植现象,从农业发展角度对当地也有极大的影响。从前特产的嫩竹细枝,是各类纸张等特产出产的基础,但由于改种罂粟,竟然影响到“纸张生产大减”。1900年前后,全省罂粟种植面积达473,700亩^{[3]184}。19世纪末,浙江、江苏、福建、山西、陕西、甘肃、黑龙江等七个省份,成为了与云贵川三个种植罂粟最早的省份相当的地位,是全国罂粟种植最盛的地方^{[3]182}。

二、外国商船的鸦片走私

外国鸦片走私入境有两种,一种是直接进入,一种是经过中国鸦片贩由外省转卖浙江。鸦片进入浙江,以宁波、舟山、温州、台州等地为主。早在鸦片进入广东的时候,鸦片走私现象就已经出现在宁波地区。乐承耀先生在《宁波近代史纲》中指出,英国人“通过贿赂和武装贩运,勾结一些出卖民族利益的奸民,也把毒品投到宁波市场。把宁波、舟山作为贩卖鸦片的场所。”^{[1]33}

宁波、舟山面临东海,具有许多天然港湾,最易船只隐蔽。这种天然良港的位置在近百年中吸引了当时海上强国的目光。1792年9月8日,英国大臣丹达斯在给出访清廷的马戛尔尼的训令中就指出:“孟加拉鸦片的销售就必须放在一个公开的市场上去试试,或者在东海分散、迂回而间接的交易中贩卖出去。”^{[4]225}这还是在鸦片走私到中国之前,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东部沿海对于英国人的重要性。马戛尔尼所受的这个训令实际上是之前英国人尝试输出鸦片失败行为的翻版。在17、18世纪之交,宁波、镇海和舟山海域已经频频出现英国烟贩的鸦片走私船。“1701年(康熙四十年),英人凯切普尔就运鸦片100箱(每箱100斤)来定海,打算来宁波贸易,但没有得逞。”^{[1]33}根据《宁波港史》的记载,1757年以后,距离后来的鸦片大规模走私还有约100年的时候,宁波出现的鸦片,已经“绝大部分来自停泊在广州洋面上的英国船”^{[2]43}。

就浙江而言,晚清时期的鸦片流播早在清中期就已经初具规模,只是当时人们对此的认识都非常模糊。正因为整个清廷对鸦片流播现象的不精确性认识,很快,鸦片越来越多地进入浙江。

1819年,宁波镇海县查获2名烟犯,以及193两烟土^{[1]33}。1839年前,包括定海在内的宁波地区,“每年的鸦片输入量大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1]33}。乐承耀先生的估计是,1831到1840年间,由宁波走私入境的鸦片“约二万三四千箱”^{[1]33},鸦片贸易额超过了正当的商品贸易额。就宁波城的景象来看,鸦片使当地社会生活出现这样的现象,“城内鸦片馆极其奢华,馆内伺客人者多十余岁女子,衣服首饰色色都佳”^{[1]34}。

鸦片战后的《南京条约》中,宁波开辟为通商口岸。尽管鸦片并未是条约允许的合法贸易货物,但实际上,英国开来的走私船在镇海河口地方抛锚、卸货,商人再将鸦片转运各地,鸦片在贸易过程中被流播各地消费。英国驻宁波领事是鸦片流播的重要中介环节,他们“给鸦片贩子在宁波贩卖烟土提供了各种方便,鸦片贩子则支持领事的经费。宁波英国领事的收入,一度完全由定海宝顺洋行鸦片趸船所供给。”^{[1]73}原在旗昌洋行工作的美国驻宁波副领事吴利国,在宁波公开贩卖鸦片时,其所雇用的商船“挂起美国的国旗,使他(洋)行里的鸦片船不到海关上去申报进口”^{[1]73}。定海的鸦片输入也是宁波地区的一大重点。1845年输入鸦片约为3650—4400箱,价值200多万两白银,几乎占全国鸦片输入的1/10,相当于宁波与宁海进出口总额的10倍。

杭州是外国鸦片进入浙江的另一个重要关口。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1897—1900),报经杭州关进口的外国货中,鸦片年

进口量占百分之三十左右。鸦片走私还从浙江周边省份入境。据《上海禁毒史》的研究,“经过中外几代鸦片贩子的精心运作,由上海通往周边各地的黑色鸦片销售渠道也已打通。… …其三是利用收购丝茶的渠道,将鸦片贩运至江、浙、皖、赣等中国最负盛名的丝茶产地。”^{[5]27}收购丝茶的正常商品流通途径,也被扩大了本身的作用,鸦片流播可谓无孔不入。

三、省内鸦片的流播蔓延

从杭州、宁波、台州、温州等地鸦片入境情况来看,鸦片在本省范围内的流播主要在北、东、南三面。

东部,“鸦片进口,吸食者日众,使宁波人民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216}。前述定海、舟山、镇海等地作为宁波的辖区,发生众多鸦片入境事件,宁波可以看作一个鸦片集散地。

光绪二十三年(1897)杭州开埠,鸦片进入浙江的中介转向杭州,后来,鸦片入关的地点迁移到嘉兴。嘉兴地区也遭受了 19 世纪以来严重的鸦片危机。1897 年,当地成立戒烟会的事实说明,嘉兴遭受的鸦片毒害,已经造成并不轻松的社会压力。

金华、温州、台州、丽水等地水运较多,烟毒借此流播城乡^[6]。温州在嘉道之际开始出现花会和鸦片的传入。学者胡珠生指出,民间吸食鸦片在道光初年以后,“但开始成为社会问题则始于道光十三年(1833)”^{[7]16}。瑞安的一个例子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鸦片在温州的流行程度和负面影响:薛浚淮父因为鸦片烟案费银近万,母所遗田六百亩已失大半,临终遗戒浚淮,慎勿蹈此覆辙。”

温州社会秩序正是在花会和鸦片盛行的情况下,开始受到严重的毒害。而这种毒害兼具的影响力超出地区范围,向丽水扩散。丽水地区的松阳县也出现了鸦片,“是由温州经丽水传入”^{[8]68}。鸦片烟馆在松阳县城及该县各地都有,目的就是满足吸食鸦片者的需要。当地人称吸食者是“吃红丸”、“吃白粉”。传入松阳的鸦片产自温州种植的罂粟。温州人看“经营鸦片有巨额利润”,因此引种种植,熬制土烟,又以较便宜的价格卖到松阳各烟馆,前往购买者并不少,这也是鸦片流播的重要因素。

杭州海关是鸦片在浙江本地流播的又一重要地点。光绪二十三年,鸦片首次经杭州关进口,当年进口量为 979.6 担,值银 543,800 关平两。光绪二十五年,杭嘉湖道台对进口鸦片发给津贴,每箱三两八钱,促使烟商将原由宁波海关进口的鸦片改报杭州进口。是年,鸦片进口比上年增加约一倍,为 1962.7 担,杭州成为继宁波之后浙江鸦片重大转运、经销市场。光绪三十二年禁烟起,鸦片进口和销售受到抑制。宣统二年,官发鸦片津贴取消,并减发吸烟执照,关闭烟馆,焚烧烟具,当年鸦片进口由上年的 1034 担减至 363.9 担。民国元年杭城颁布禁烟告示,违令者重罚,或家产充公或长期监禁或处以极刑,同时于城内设官立“戒烟局”,掌管全城禁烟之事。至此,鸦片进口停止。报经杭州关进口的各种鸦片,主要由所属嘉兴分关承运,并在分关完清税厘后,再运入杭州及其它各地销售。据记载,清光绪三十年,由嘉兴分关进口的全部鸦片,“有二十分之十九分运来杭州销售”。鸦片的主要品种有白皮土、公班土和喇庄土。波斯土很少,光绪三十年进口 37 担。在“洋药”进口的同时,“土药”(国产鸦片)也有大量入口,主要品种有四川土、江苏土、云南土等^[9]。

可以看出,清末,鸦片很快由宁波转移到杭州入境,实际由嘉兴处理此项业务。这时的鸦片流入已经成为一项日常工作,地方政府、海关官员按例办事。改由杭州入口的鸦片,竟然与杭嘉湖道对进口鸦片发放津贴有关,禁烟已经与清中后期的法令成为两种概念。

嘉兴代表杭州取代了宁波的地位,成为鸦片入口转至浙江各地的集散中心。与此同时,国产鸦片烟土也与进口洋烟取得了同样的销售渠道地位,四川、江苏、云南等地的鸦片大量进入。“自清光绪二十三年首次进口至宣统三年(1897—1911 年),报经杭州关进口的各种鸦片(不包括土药和“波斯土”)计 22,182.19 担。其中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为最盛时期,每年报经杭关进口的鸦片数量 2000 担以上。光绪三十年为最高年份,达 2492 担,值银 1,814,932 关平两,约占当年杭州关外国货进口值的 35%;关税约占 39%。”^[9]

四、鸦片吸食与烟膏店铺

吸食鸦片造成的人体生理消费结果最简单的说法是上瘾,因为上瘾而造成的持续危害才是最重要和最难根治的。19 世纪末期的浙江,深受自身吸食鸦片之害的人不在少数,其中一位谈到了这种糟糕感觉,“仆奔走四方,每当酒后茶余,鸦片一道,素所性好。始则详间、解闷,偶一为之,继而渐渐入其彀中,以致俾昼作夜,精神不顿。频年来,大受其累,有刻不能离之势。”^{[1]216} 从此人的自述来看,鸦片危害已经十分清楚了,吸食鸦片造成的“精神不顿”会直接导致体力和劳动能力的丧失。时人还有如下描述鸦片吸食危害的状况,“烟之若瘴,烟毒若蛇。枪新枪老,杀人如麻。”^{[1]216} 有识之士在报纸上撰文批评这种恶习,认为鸦片比洪水猛兽危害尤烈,鸦片种植更是“伤农害稼”的行为。

鸦片之害是有吸食者才成灾的,清朝嘉庆、道光之后才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6]。鸦片消费在浙江各地的情况显示,鸦片贩卖与吸食等情况交织在一起。道光十九年(1839)年初的时候,据当时的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的报告,在杭嘉湖衢等地均有烟犯及烟土烟膏的拿获信息,详见下表^{[2]31}:

鸦片拿获地区	烟犯	1.烟土 2 烟膏 3 烟渣 (单位:两)
台州府	17	1、2 3270 余两
宁波府	3	1、2 1580
西安、江山县 (衢州府)	6	1 796
乌程、归安县 (湖州府)	18	1、2 132
镇海县 (宁波府)	2	1、2 193
嘉兴、秀水、嘉善、海盐、平湖	40	—
仁和、钱塘、山阴、萧山	36	1、2 不详
宁海 (当时属台州府)		铲除罂粟花苗 230 余亩
合计	122	5970 余两

由上表来看,鸦片泛滥已经到了一个难以复加的地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鸦片输入激增,烟毒泛滥,吸毒的人口日益增多。烟馆到处都是,吸食遍及社会各个阶层。”^{[1]215} 宁波的鸦片消费现象亦十分严重。“洋烟(药)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运到宁波,成为市场上充斥于各处的商品、流行的通货。”^{[1]215}《马关条约》签订后,从宁波进口的鸦片虽有减少,但仍居进口洋货的第一位。1897 年,“宁波进口的 8 类主要商品中,鸦片进口仍占一定比重。具体是鸦片 28.5%,棉制品 26.3%,金属 11.9%,糖类 13%,毛麻织物 1.6%”^{[1]215}。

鸦片通过烟馆,以及“外人居留地当局和清政府地方官员的放纵”,在宁波的江北岸、灵桥门、崔衙街、东渡路等地都有烟膏店开设。这些场所“买卖鸦片,公开售毒”,成为鸦片消费行为的重要中介。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禁烟令下,宁波始关闭烟店烟摊,悔过登记的鸦片吸食者有 2 万多名。由此可见,19 世纪末的宁波这个县级规模的地方,鸦片吸食人群已经呈现相当规模。

宁波的主要鸦片消费中介,如“王礼记、白玉楼、茂昌栈、甬又新、两宜春等店铺”^{[1]215},都是当时规模较大的烟店。他们为

鸦片消费提供了广告作为招揽生意的重要方式,销售鸦片成为一种正常的买卖。烟店王礼记的广告称其:“开设有四十余年,独办大小洋药。老陈庄亲身督制煎就”,“力道香味比众不同,面向设立招牌刻明。如有浆膏次土才(掺)和,霹雳不烧。”^{[1]215}这则广告提供的不仅是鸦片消费在彼时如日中天的景象,而且告诉我们从最晚 1850 年起,这家店铺就已经开始提供鸦片消费的服务了。此外,虽然其称鸦片为“大小洋药”,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意思而已,其所提供的鸦片当属纯度较高的品种,不只是有所谓的能人“老陈庄”亲自监督制作,而且绝对不掺假。所谓的经营烟膏店也是绝对正宗的意味。综合来看,这是一家较早开办,为上层社会提供精致鸦片消费的场所。

这只是宁波一家烟膏店的状况。《德商甬报》还登录了另一家烟膏铺白玉楼的广告。白玉楼“专办大小洋药,而其味香透众,比众不同”。同样,茂昌栈也对其专事洋药烟膏店批发的业务推上了报纸的广告专栏,“专门佳制烟膏,气味甚香,力性甚足”^{[1]215}。据不完全统计,宁波在当时就设有洋烟店 10 多家。大做广告是这些烟膏店铺招揽生意的得意之笔,还有“许多商店为此假冒伪劣洋烟”。

普通乡民受此行为习染后也加入这种所谓“享受”中,结果走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不在少数。富家子弟也有将殷实家底全部耗光者,最终因为吸食鸦片,不仅造成人力资源的丧失,更有社会风气的衰败。台州府属黄岩县,“鸦片……其初售价至贵,富家后生始为作俑,后乃乡闾之间无不渐染。……大家累世积储之业,化为乌有者不可胜数,而士风颓靡,细民失业,多由于此。”(光绪黄岩县志·风土·总论〈卷三十一〉)

综观晚清时期浙江鸦片问题及其状态,大致分为两种状态或两个阶段:一是鸦片走私猖獗之时地方官员出谋划策,随处堵漏,力禁外洋鸦片之侵入与内地罂粟种植;二是烟禁状态的实际疏漏,沿海地区在成为烟毒入境的重要通道,到光绪统治末期,杭州取代宁波,成为浙江首屈一指的鸦片进入地点,而其他曾经是鸦片入境的地区继续发挥着接纳毒害的作用。普通民众的参与既指围绕鸦片贩卖图利之人,也有倾家荡产消费吸食的人群。这些状况是晚清浙江烟毒侵害的真实写照,也是当时社会生态的颓败情形,颇值人深思。

参考文献:

- [1] 乐承耀. 宁波近代史纲[M]. 宁波:宁波出版社, 1999.
- [2] 炎 明. 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上册)[M]. 宁波:宁波出版社, 1997.
- [3] 苏智良. 中国毒品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4] 马 士. 东印度公司对华编年史, 第 2 卷[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1.
- [5] 苏智良, 彭善民, 胡海英, 张 虹. 上海禁毒史[M].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 [6] 吴立梅. 吴望伋霹雳禁鸦片[EB/OL]. <http://www.cnwu.net/rw/ls/201003/7422.shtml>.
- [7] 胡珠生. 温州近代史[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 [8] 阙良庆. 松阳乡土史[M]. 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8, 68.
- [9] 杭州志·对外经济贸易篇·进口贸易·鸦片[EB/OL].
<http://www.hzz-dwmy.zj001.net/showhdr.php?xname=99APJU0&dname=5Q04KU0&xpos=12>.